



国外中国学研究丛书

何培忠 ◎ 主 编

Dang Dai Luosi Zhong Guo Xue Jia Fang Tan Lu



当代俄罗斯中国学家 访谈录 (二)

高 媛 石之瑜 ◎ 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国外中国学研究丛书

何培忠 ◎ 主编

Dang Dai Luosi Zhong Guo Xue Jia Fang Tan Lu



当代俄罗斯中国学家 访谈录 (二)

高 媛 石之瑜 ◎ 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俄罗斯中国学家访谈录. 二/高媛,石之瑜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4

(国外中国学研究丛书)

ISBN 978-7-5203-4174-5

I. ①当… II. ①高…②石… III. ①中国学—研究
IV. ①K2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48594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许红亮
责任校对 郝阳洋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1.5
插 页 2
字 数 340 千字
定 价 8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 序

国外中国学研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创和长期坚持的学科。

1977年，在已故著名学者孙越生先生的倡议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当时的情报研究所下设立了国外中国学研究室，这是我国大陆地区第一个专门研究国外中国学的机构。该研究室成立后编辑出版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如《国外中国研究》丛书（1977）、《美国的中国学家》（1977）、《外国研究中国》丛书（1978—1980）等，带动了我国学术界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国外中国学（海外汉学）研究的发展。直至今日，这些出版物仍是我国学术界开展国外中国学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

面对20世纪80年代后国外出现的中国研究热潮，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研究部开展了“改革开放以来国外的中国研究（院A类重大课题，课题负责人何培忠研究员）”，对20世纪80年代后的各国中国研究进行了全面梳理，并出版了专著《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2006），使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国外中国学研究又上一个台阶。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学”在国外越来越受到重视，成为一门引人注目的“显学”。为了加强对国外中国学的研究，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院级非实体研究机构“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由汝信副院长、黄长著学部委员挂帅。此事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和媒体的广泛关注。这是因为，国外中国学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创立之后，虽然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但后来国外中国学研究室被撤销，成为学术界的憾事。而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的成立，则被学术界看做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启这一领域研究的标志性事件，就连国外学者也因他们的研究开始受到中国社会科

学院的重视而深受鼓舞，许多学者借来华的机会到研究中心访问，做学术报告，进行学术交流。2012年，出于进一步推动国外中国学研究领域发展的考虑，中心更名为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后者虽只有一字之差，但它更强调不同国家、地区中国研究传统的多样性及其比较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国外中国学研究以资料积累丰富和对前沿研究状况反应迅速见长，现已初步建成了“国外中国学家数据库”、“国外中国学机构团体数据库”、“国外中国学期刊数据库”、“国外中国学论著题录库”和“国外智库中国研究资料库”等数据库。2009年，“国外中国学研究”网站上线（后统一更名为国际中国学研究，网址为 sinology.cssn.cn）。同在这一年，当中国社会科学院启动新一轮重点学科资助计划时，在院领导的关注下，“国外中国学研究”被列入“特殊学科（负责人何培忠研究员）”，使这一学科的发展有了一定的保障。2015年，在上一轮学科建设基础上，“海外中国学研究”成功申报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扶持的40余个优势学科之一（负责人张树华、唐磊），标志着该学科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确立。2018年末，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式批准信息情报研究院关于恢复国际中国学研究室建制的申请。这使得我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内从事国外中国学研究迎来了研究室、研究中心和学科三位一体的发展格局。

为继续积累有利于国外中国学研究的基础性资料，深化有关领域的研究，回应国外学术界的种种观点，我们决定继续组织“国际中国学研究丛书”（原“国外中国学研究丛书”）的编纂与出版工作。该丛书涵盖面广泛，有对国外中国学家治学历程的描述，有对国外中国焦点问题研究的辨析，有关于国外中国研究学科发展历史的记述，也有国外学者研究成果的直接译介等。我们衷心希望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学者和广大读者关注本丛书的出版，献计献策，使其成为我国学界研究国外中国学的一个园地。

何培忠

原序于2011年7月28日

修订于2019年1月18日

出版说明

本书是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资深中国学家的访谈录，是从2009年起连续四年经东方学研究所的协助完成的。本书的面世源自台湾大学政治学系中国大陆暨两岸关系教学研究中心开展的“中国学的知识社群研究”计划，该计划已在日本、韩国、印度等国展开，并扩展到欧亚各国。其中当代日本中国学家的访谈录《当代日本中国学家治学历程——中国学家采访录（一）》于2011年10月出版，收录了当代十位日本著名中国学家的访谈录。印度中国学家的访谈已完成，并集结出版（英文）。其他访谈录及其相关研究日后会陆续推出。

有关俄罗斯中国学家的访谈，缘起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对俄罗斯访问。2008年9月，何培忠主任率团赴俄罗斯科学院履行年度交流计划，台湾大学石之瑜教授参加了访问活动，在访问中向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东方学研究所等研究机构通报了中国学家访谈计划内容，后几经交涉，得到俄罗斯科学院有关研究机构的支持。负责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中国学家访谈计划的是甘申（В. Г. Ганшин）教授和戈尔布诺娃（С. А. Горбунова）教授，访谈部分成果已于2015年出版。负责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中国学家访谈计划的是刘宇卫（瓦连京·戈洛瓦乔夫，В. Ц. Головачев）负责，部分成果形成本访谈集。访谈稿的翻译由海峡两岸的学人完成。本书是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中国学家访谈录的一部分，其余还在翻译校对中。访谈稿的翻译很辛苦，在编辑这部分译稿时，俄罗斯学者增加了许多注释，本集访谈录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外社会科学》编辑部高媛副研究员编辑完成，并进行了原文校译。

本书是根据访谈录音整理出来的，由于一些访谈对象年事已高，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时间的追述，难免有叙述不准确的地方。翻译过程中，在尊重本人叙述的基础上，对一些明显错误进行了纠正，对访谈者谈话中涉及的人物，能核实的核实，无法核实的采用音译。即尽管翻译、编辑下了很大功夫，文内恐还有不准确的地方存在，望读者发现后指出。编者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何培忠

2017年6月

中国研究专家口述治学史的知识意义

当代中国研究面临的知识挑战

当代的中国研究中，曾出现过几个涉及知识论的争议，虽然没有掀起惊涛骇浪，但是对于中国研究的意义，却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挑战。这些争议，涉及中国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中国研究学界与主流社会科学的关系问题，研究课题的问题意识是否正当以及意识形态如何影响并介入学术研究等。这些发自中国研究界内部的反省，只是零零星星地出现，在过去几十年周期往返般地若隐若现，并没有真正对从事研究的人造成重大冲击。不过，近年来由于学术环境的变迁，中国作为研究对象本身也经历了堪称剧烈的变动，适逢新兴的文化研究将身份研究从人文学界输出到社会科学界，除大量具有中国身份的研究者加入学术界的对话，动摇了原本欧美学者观察中国时为自己所预设的客观基础，更有四面八方关于社会科学知识论的研究正随着全球化的进程逐渐浮现。换言之，研究对象与研究者的自我认识上的困惑。原本各有其所的知识主体与知识客体之间，关系出现混淆。在这样的背景中，中国研究遭到的挑战，其巨大的潜能与严肃的程度都是不言而喻的。

第一个挑战，是如何面对过去已经完成的学术成果。

倘若过去的研究建立在一个今天已经受到质疑的问题意识上，或已经动摇的知识主客体关系上，是不是或该不该将这些已有的研究一笔抹煞？在各自的中国研究学界，这一类问题并不是第一次碰到。包括战前日本支那学界受到的质疑，也包括战后当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引介到欧美的中国研究学界时，学术殿堂中充斥着这样义无反顾的姿态，认为既有的人文研究，对建立跨越

时空的普世理论没有贡献,甚至应予抛弃。社会科学家这种居高临下的先进地位,固然曾经引起辩论,其实并没有完全排斥既有学术成果继续受到重视与参考。不过,当前关于知识主客体关系的怀疑,却因为针对了中国是什么的根本问题,几乎与过去多数不曾有过这种质疑的研究之间无法对话,不但是因为本体论的迥异而无法对话,也因为态度上的相互疑虑而无法对话。

第二个挑战,是今后要如何设定研究课题的问题。

既然知识主体与知识客体之间存在相互影响与相互构成的关系,谁在研究谁的循环现象使问题意识与研究课题的设定都不能避免出现武断,这种认识,使研究工作不能在一个心安理得的基础上进行。尤其当研究者意识到自己观察位置的相对性之后,研究工作的意义就显得漂浮不定。既然任何研究课题都难免对研究对象产生操弄与宰制,研究者如何自持?是不是只要有意识地承认,自己研究工作中隐含了意识形态主张、身份主张或关系主张,就可以大言不惭地继续下去?而能永远不怀疑自己的主张因为是来自片面的历史经验,不能成就知识的普遍性,因此也没有超乎自我的知识意义?于是乎,本来中国研究是在研究所谓的中国,但当前却变成是自我揭露的马脚。旁人透过自己对中国研究作品字里行间的蛛丝马迹,而取得对自己早有立场的证据。

上述两大挑战共同影响中国研究的知识伦理。如何面对这些挑战,是中国研究作为学科领域的生存关键,也是中国研究者与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如何或是否能继续相互构成的关键。处理这个关键的方法,是探究不同性质的知识彼此间的关系,姑且称之为“知识体系的伦理关系”。对此伦理关系的反省与掌握,是让不同知识假设及其生产过程取得本体论与知识论层次上的联系,从而容许每一位研究者,根据这个伦理关系,界定自己的位置,也判断旁人的位置。再根据旁人对我与对他做出的判断,相互比较,作为决定自己下一波研究课题移动方向的参考。简言之,知识伦理体系的勾勒,以及未来此体系的开展,与个别研究者在其中位置的界定与迁移,共同赋予研究者一种赖以自我定位的空间意识,使研究者对自己所同意或不同意的知识立场,对之掌握到某种伦理上的相对关系。这个知识伦理体系中的位置,足以使研究者产生好奇心,能依循伦理关系中的相关位置,前往自己不熟悉或曾抗拒

的知识立场，也邀请其他研究者，进入到自己的研究位置，彼此相访，但不会彼此威胁。伦理关系随着时代而变迁，因而不能有固定的方面，应当依照当事人的体验来开展或关闭某些新的或旧的方面。所以，关于知识伦理系统应有的方面，在探讨时只能采用归纳的方式，而不宜采用推论的方式，亦即应当根据中国研究学界已经提出的、意识到的、关心的且尚未被遗忘的那些方面，来处理不同知识论与本体论之间的关系。

根据这样一个原则，可以讨论三个方面，第一是涉及欧洲中心与中国中心两种知识之间的关系，第二是涉及普世研究与历史研究之间的关系，第三涉及结构性知识与诠释性知识之间的关系。这三个方面，各自将中国研究既有的知识分解，若不加以疏通，势必继续造成理论之间无法相互沟通，甚至试图沟通时，还会引起否定自己研究课题的解构效果，毕竟不同知识立场所采取的语言与推论过程，没有共通的本体论作为依据，一旦相互碰撞，就产生抹煞掉彼此知识本体的尴尬。

早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欧美学界就曾针对中国研究中的帝国主义观点进行批判，认为欧美的中国研究，过多地从现代化史观出发，在现代化史观之下，认为中国的近代化，必须依赖来自于欧美的刺激，俨然帝国主义是拯救中国的良方。批判者从而期许一种中国中心的知识，鼓励今后研究者能在中国发现历史。所谓从中国发现历史，就是在中国找寻促成近代化的因素，从明清以降的历史发展中，整理中国自身变迁的动力，以推翻中国必须依赖帝国主义的说法。这些因素包括国家汲取能力的衰退、人口的增长、公共领域的出现等等，也包括对中国作为一个旧帝国，其内生的解放力量何在的探究。新近犹有更深层的反思，甚至开始质疑这些所谓中国中心的研究，其实依旧停留在欧美中心研究课题上回答问题，因为他们想要找寻的，还是中国迈向欧美现代化模式的动力，只不过认为中国自己有其动力而已。从质疑欧美中心到主张中国中心，再到质疑中国中心，不同研究者对于自己与研究对象处于什么关系，各有假设。不同的假设之间，似乎有一个看似不可逾越的鸿沟，在妨碍他们相互阅读各自所发表的中国研究成果。

中国研究学界另外一个自我反省的角度，在于中国研究有多大程度能被主流社会科学接纳为一种科学知识。科学知识的要求，是能够将适用于中国

的行为规律的理论,与人类普遍性的行为规律理论衔接。如果一项关于中国社会现象的发现,不能对普遍性规律有所启示,则这个发现似乎只能是一种伪知识。衔接之道,最初是将社会科学主流的理论应用到中国,将中国作为例子,之后有学者大胆主张,可以在中国的经验中,发现新的、过去未曾发现过的普遍性行为规律。社会科学对普遍性知识的要求,以及引导研究者脱离中国的历史环境,改用抽象概念表达的理论,并不为中国学界完全接纳,反而认为从中国的历史演变中,所汲取的特定知识,对于了解中国更有帮助。这个科学与历史的分歧,类似国际关系学界中行为主义与英国学派的差异。在冷战时期,因为有关中国的信息不易取得,所以靠着对中共党政军有亲身经历的研究员,或在香港齐聚,就近窥视,探访难民之类的手段,据以判断北京政策发展的所谓北京学,独占鳌头。在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可以作为一个供比较的案例,因此科学方法成为主流,所有的事件或对象都视为是在跨时空的法则之下,受单一行为结构的制约。但另一方面,也出现有意识地在中国的历史脉络中整理通则的努力,港台学者较早着墨于此,21世纪后对中国模式的探究更在大陆知识界蔚为潮流。但是,这个努力并不追求与普遍性理论对话,于是就使得科学知识 with 历史知识之间的领域,阻挠了彼此间的阅读与理解。

文化研究兴起之后,第三个对知识性质的分歧也随之在中国研究学界出现,将知识视为一种身份策略的再呈现,等于根本质疑客观知识的存在,其目的是想说明,研究对象的存在状态会如何因应知识的内涵而不断地调整。这个挑战,从本体论上推翻了客观科学规律的可能性,针对一般社会科学研究课题上的语言与观念,进行特定环境与历史脉络的再诠释,根据历史时期与人物环境,赋予这些概念迥然不同的含意,从而否定了所有科学命题皆应跨越时空的宣告。如此一来,研究对象如何诠释自己的环境,才是知识的来源,研究者没有资格站在外于研究对象的观测角度,武断地解说研究对象某项行为的原因。但是研究者要进入研究对象的环境谈何容易,因此即使是诠释性的理论,也不能避免理论基础,故而也就不能避免武断。在这样的知识论之下,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有一种协商关系,共同在参与知识生产的过程,每每他们任何一方对自我的理解发生转变,或身份策略有所调整,则行

为意义的解释就随之不同，如此一来，知识内涵当然就发生变化。可见，在诠释性的知识方面，研究者本人的身份是构成知识内容的重要元素，没有一项知识能脱离研究者的身份，所以研究者的性别、族群、阶级与家庭、人格、经历等等特质，都牵涉到自己观察研究对象时的情感波动与研究态度。与科学知识相比，后者建立行为规律所依赖的，是能够发现某项行为背后起制约作用的外在社会结构，这些结构具有高度的物质性，也就是不依研究者而转移的客观性，如此与诠释性的知识强调知识没有固定不变的基础，就属于南辕北辙的立场。

资深学者口述史的知识意义

对中国学家知识生涯口述史的研究，旨在促进中国学研究过程中，能免于将知识生产过程客观化，因而采取个人化的知识史再现方式，透过个人知识史的整理与比较研究，最能说明知识意义的多元性，因时空与人心而有不同。由于个人知识史涉及访谈对象与访谈者的互动，也涉及与其他访谈对象的比较，故而足以提醒研究者，此一个人知识史的再现，主要是当代意义脉络下的再现，而不是个人知识史的所谓客观描述。此何以文本分析所引入的诠释研究，有助于避免以真假与否的态度，窥视或检查口述历史的内容，而是藉由口述历史，反映资深研究者在衔接过去问题意识与当代问题意识时，决定采用什么论述脉络，从而反映出中国学的一种可能意义。口述历史帮助研究者发掘各种意义的可能性，是凸显研究者、研究对象与研究结果之间相互构成关系的适当途径，而不必是访谈对象知识成长的客观描述。

口述历史访谈的推动，由项目主持人、协同主持人偕同国外合作之主持人共同推动。透过对资深学者的访谈，了解知识社群的文化、历史脉络，以及他们所处的当代环境，他们所生产的知识的重要内涵，对于该知识社群认识到自己所生产的知识具有什么意义，会有极为重大的贡献，同时对于其他知识社群在阅读该知识社群的作品时，有能力将这些作品放进特定的文化历史时空中，更关键的是，培养其他知识社群进行同样反省的意愿，于是协助所有的知识社群，都能彼此认识到自己的知识视角，从何而来，彼此如何相互影响，相互修正，相互误解。基于这个原因，必须邀请所研究的对象社群，

共同参与研究。在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中,为了解研究对象,而对研究社群进行研究,本研究计划堪称首见,更是中国研究主流所从来没有设想到的,因为在既有中国研究之中,被研究的所谓中国人,不论是正面或负面意义的参与,都只是对象。现在,藉由研究社群共同参与检讨,让研究者也能从这样的方法中,体会自己的研究对象,让对象在自己的研究课题上参与知识建构。

不必宣称由于个别资深学者的学思历程具备这样或那样的代表性,故选择或不选择他们作为口述历史的受访者。这是基于研究团队成员的机遇、巧合与情感,但是受访者的学术活动无不隐然说明了一种对中国进行想象的结构。正是这个结构的想象性(而不是代表性),使每份访谈具有独特的意义,促使受访者、访者与读者必须通过反思来进行意义上的选择,从而有意或无意地修正尔后对这个结构的想象空间。这些受访学者的生涯,均有部分是坐落在某种隐而不显的位置,那可能是多数人都或多或少经历的位置,即某个同时处在所谓中国与所谓亚洲之间以及所谓东方与所谓西方之间的位置。这个容许从多方面、多出发点研究中国的过程,形成了边界模糊的场域,在此场域中,各种涉及中国的概念、意识或表征,可以被研究者不断挪用与再挪用,以至于同时又永远保留了某种再开展的可能性,故研究者得以不断地从群体与个人出发,在有意识或意识不足的身份抉择中,来开展自我认识。

在地缘、语言与时间上,受访学者所处的角度非常不同。虽然他们分别来自不同的社群,在不同的地方工作,主要本职所在地可能集中于一个国家,但他们的研究无不深刻影响其他社群。中国研究不可避免地镶嵌在受访者内摄的文化与地理的多元性中。从这个角度来看,与中国特殊性有关的新近主张诸如“崛起”、“天下”、“中国特色”等等所代表的,是某种具有本质的中国,不再是研究必然的前提。故除非是认为民族国家是当代主要文明的唯一有效载具,不然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就不再可信。无论是承认或否认中国的特殊性,都已经预设了一个关于中国的身份选择,因此也就没有必要用学术或政治中立的要求彼此检证,因为中国是否具有特殊性或是否在扩张,都必然涉及中国是什么或中国的范畴何在的认同与政治实践。

当然,受访者不可能完全掌握这个有时隐而不显的立场,更可能的情况

是，他们也不充分了解自己以中国为主题的学术作品与个人认同，究竟是被什么决定的？学者们既不能控制他们已经或正在遭遇的政治社会情境，也同样不能控制这个隐而不显的概念场域的形成。例如，他们所操持的学术语言，对于任何一个本身就已具有另一种通用语言的学术社群而言，都有不可避免的意义，毕竟能不能或如何分享他们的英语文本，是必须在意识上加以处理的问题，因为每一个群体都各有因应英语化的中国文本之道，并以此反映出他们既有论述结构之间的差异。然而，个人如何具体根据这种论述结构的差异来进行语言与文本的选择或不选择，就不再是既有论述结构可以说明的，如此，研究者与多种论述文本的遭遇以及遭遇之后的抉择，是中国研究得以发生的两个主要机制。

简言之，中国研究所涉及的是关于中国的论述及其如何从既定的脉络中形成的可能性，故而是在已有的知识中，通过研究者的选择而开启的另一种知识生产。对于研究者本人而言，这后一种生产过程不是全部可见的，因为在研究者意识中所能掌握的，只有指向课题（即中国）的单一知识过程而已。必须通过反思受访者的问题意识概念，才能将这个隐而不显的过程以归纳方式整理出头绪。受访者所处的历史脉络当然无法完全说明他们的学术选择，除了他们有意识地于知识生产时的当下做出的立即选择之外，还有另一种更深层而可界定受访者自己与研究课题之间关系的选择存在。因此，这里讨论的选择也包括一种后设的，不一定在直觉中可被研究主体第一时间所把握的选择，可以称之为对只是对象的本体概念选择，是以访谈与论述分析所回溯出的一个给予研究者立场的空间，如此研究者的立场便必然属于其自身存在方式的合理选择，旁人无由妄加褒贬。于是，有必要区分两个层次的中国研究：第一个层次是在遭遇与选择两个机制中实践的可观察的中国研究，第二种是口述历史访谈尝试归纳的一种没有办法在论者的研究开始进行之前被决定的中国研究，也就是等待论者可意识到的研究过程展开后，才能回溯其意义的另一种知识生产过程。

当代俄罗斯中国学家
访谈录
(二)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目 录

阿·阿·博克夏宁访谈录.....	(1)
尤·米·加鲁什扬茨访谈录.....	(30)
利·伊·戈洛瓦乔娃访谈录.....	(55)
列·彼·杰柳辛访谈录.....	(94)
卓·德·卡特科娃访谈录	(125)
斯·约·库切拉访谈录	(137)
叶·伊·克恰诺夫访谈录	(171)
季·格·拉宾娜访谈录	(217)
格·瓦·梅利霍夫访谈录	(251)
尤·弗·丘多杰耶夫访谈录	(285)

阿·阿·博克夏宁访谈录



访谈对象：阿列克谢·阿纳托利耶维奇·博克夏宁^①

俄文姓名：Алексей Анатольевич
Бокщанин

职 务：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
中国部主任

学术专长：中国历史、中国古代对外关
系史

访 问 者：瓦连京·戈洛瓦乔夫（刘
宇卫）

翻 译：廉晓敏

时 间：2009年2月16日

地 点：莫斯科，俄罗斯科学院东方
学研究所

问：阿列克谢·阿纳托利耶维奇，我非常高兴，能有这样一个特别的机会，听您亲自讲述自己作为一个俄罗斯的中国学家的经历和活动。我认为这样一个项目非常有意义，也很有趣，因为这样不但有机会记录下您对中国和

^① 已于2014年7月11日去世。